

「測不準」的康生和測不準的體制

——評余汝信編《康生年譜——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生(1898-1975)》

● 秦 暉



余汝信編：《康生年譜——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生(1898-1975)》(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23)。

余汝信先生的力作《康生年譜——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生(1898-1975)》(以下簡稱《康生年譜》，引用只註頁碼)最近出版了。

康生是中國共產黨史上的大人物，他曾長期主掌中共的政治保衛部門而有「中國的貝利亞」之稱，在共產國際工作和搞意識形態論戰等方面也崢嶸盡露，文化大革命中更坐上了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中共中央第四把交椅。他在1975年去世時極盡哀榮，幾年後卻被開除黨籍，從此「臭名昭著」。在中共歷史，尤其是建政後歷史上，最高層中驚人地大起大落並以「負面評價」收場者不止他一人，但劉少奇死後得到平反，林彪、高崗雖未得到平反而為他們叫屈者亦多；死時榮耀、身後被「鞭屍」而且幾乎無人稱冤的，可以說就只有康生了。這與康生在黨內鬥爭中整人太多積怨太重顯然有關。但余先生把這位死後已被開除黨籍者的年譜賦以副標題「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生」，顯然是有深意的。

承蒙余先生命我作序，使我有幸先睹為快。而由閱讀此書引發的思考，又不是一篇短序所能容納

康生是中國共產黨史上的大人物，他曾長期主掌中共的政治保衛部門而有「中國的貝利亞」之稱。余汝信把這位死後已被開除黨籍者的年譜賦以副標題「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生」，顯然是有深意的。

的。因此寫下這篇書評，一方面談談余先生的康生研究給我的啟示，另一方面也有與余先生商榷之意。因為在下文要談的「康生是中共最高層第一個企圖搞掉『四人幫』的人」這一問題上，我與余先生的看法是略有分歧的。余先生認為最早揭露江青、張春橋為叛徒的是周恩來（頁682，註釋3092）。當時我曾表示序中不便展開討論，但是以後可以繼續交換意見。而引起討論本身，也是這本書的重大意義之一。

一 憑「敏感」整人的特工專家

提起康生，在我還是「毛粉」的極左少年時代就曾對他有過惡感。那時我對黨史幾無所知，但1968年7月25日凌晨，「中央首長接見廣西兩派赴京代表團」，當時我所在的廣西「四二二」一派被血腥鎮壓，北京的首長也對赴京代表嚴厲斥責。其中康生火氣尤大，他說柳州鐵路第一中學幾個學生寫的〈今日的哥達綱領——評「倒旗協議」〉是反動文章，而且還潛藏大陰謀。當時他責問一個學生：「你看過《哥達綱領》？」學生結結巴巴地說看過〈哥達綱領批判〉，康生厲聲喝道：「我說的是《哥達綱領》！」那學生嚇得不敢再辯。康生便咬定該文不是中學生、而是背後的「黑手」捉刀寫的，並當場指認了同為「四二二」派的一位廣西黨校教師，因為康生覺得黨校教師有資格談《哥達綱領》，所以說他就是黑手，是反動文章的真正炮製者。儘管此

人來自南寧，與柳州那幾個中學生不是來自同一個地方也不是同一代人，來京前素不相識。

當時看到這個接見紀要，我就想不通：文革前的「國際共運史」宣傳使《哥達綱領》的典故廣為流傳，我那時不僅沒見過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1875年草擬的《哥達綱領》，也沒讀過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但早就知道當年馬克思支持的愛森納赫派在哥達會議上放棄原則，與「機會主義」的拉薩爾派宣布聯合，發表了這個綱領。馬克思認為這是右傾妥協，寫了雄文〈哥達綱領批判〉予以譴責。從此《哥達綱領》便作為「無原則妥協」的典型而在信仰馬克思的地方臭名遠揚。我這個初一「新生」都知道的事，柳州那些高中生受此啟發，認為當時區革籌（北京支持的廣西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組）要他們這些「造反派」與「保守派」聯合，就是「今日的哥達綱領」，這有何奇怪？康生可以說這篇文章錯誤乃至「反動」，但說沒看過《哥達綱領》就寫不出此文卻完全沒道理。那些極左學生讀過馬克思的雄文，把「造反派」向「老保」妥協類比為當年德國「左派」向「右派」妥協，這與他們有沒有讀過綱領原文有何相干？沒看過原文就做不出這種類比？

後來我讀了〈哥達綱領批判〉，就更加驚訝了：馬克思此文不僅僅批判了《哥達綱領》的主要觀點，還加引號逐條引用綱領的全部條文，實際上等於把這份本來篇幅就很小的綱領原文複述了一遍。讀了〈哥達綱領批判〉卻沒有讀到《哥達綱領》，這怎麼可能呢？而康生的

〈哥達綱領批判〉不僅批判了《哥達綱領》的主要觀點，還加引號逐條引用綱領的全部條文。讀了〈哥達綱領批判〉卻沒有讀到《哥達綱領》，這怎麼可能呢？康生對柳州鐵路第一中學學生的呵斥反倒令人懷疑：他讀過馬克思的這篇「經典」嗎？

呵斥反倒令人懷疑：這位共產國際培養多年的理論家、中國1960年代「反修」意識形態鬥爭中那麼多雄文的組織者，他自己真正讀過馬克思的這篇「經典」嗎？怎麼連〈哥達綱領批判〉已經全文引錄了《哥達綱領》都不知道？

當然，我並不認為康生的理論水平真的差到這種程度。我想他不過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罷了。就像此前他先後毫無根據地指責內蒙古領導人王逸倫和雲南省領導人趙健民，說前者「我過去不認識……」。一看，我見他根本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也不是一個普通人。他的一些表現，做法，神態，言行，我總覺得他像個特務」（頁459）；而對後者，他說：「我憑40多年的革命經驗，有這個敏感，你對毛主席、對黨中央、對我們有刻骨的階級仇恨。」（頁537）^①

但是讀了余先生編寫的這部《康生年譜》，也使我深感人性的複雜而多面。康生儒雅飽學，講道理的本事並非沒有，有時他也通情達理，解救了不少人，把他看成妖怪顯然是不對的。尤其是他晚年臨終時，突然向鄧小平、周恩來，並通過毛澤東聯絡員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檢舉告發，稱江青、張春橋兩人歷史上都是「叛徒」。我覺得這是康生研究中一個最大的看點。康生這是所為何來呢？我過去也感到很奇怪，並注意到康生夫人曹軼歐暮年接受採訪時曾否認有過這一檢舉^②。其實康生告發江、張並非新聞。早在當年「四人幫」被抓捕後不久，中共中央專案組發布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

集團罪證（材料之一）》（以下簡稱「材料之一」）就已經收錄了章含之1976年4月25日給毛的信，提到前一年康生通過鄧鄭重約見王與唐，託他們向毛告發江、張。當時康生還是官方推崇的「康老」、已故革命元勳，他的揭發對「搞臭」剛被捕的江、張是有利的。

但是1977年9月起，中央黨校首先發難、陳雲等元老大力支持的「倒康」聲浪興起，到1979年對康生的正面評價已經被官方否定。他對江青、張春橋的告密揭發也被人遺忘，而與江勾結共組「反革命集團」的惡名自此昭彰。1980年，康生在去世四年多後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並在同年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大審判中名列僅次於林、江的第三「主犯」。人們當然知道林、江雖然都被毛澤東重用來整人，但其實並非同一個「集團」（也可以說，只有在以毛為首的前提下他們才算是一個「集團」），而康生既是中央文革小組要員，1971年林垮台後又與江、張一起繼續走紅，直到去世，當然就是江青集團的主角之一。以至於曹軼歐為康生辯護也必須同時為江辯護，她不承認康生告發過江也很自然。

另一方面，復出不久的胡耀邦曾在中央黨校的一次譴責康生的講話中認為康生陰險毒辣能量驚人，如果他不死，「四人幫」可能不會垮台^③。顯然，無論是曹軼歐的辯護還是胡的譴責，都認為康生至死都與江青、張春橋抱團。尤其是胡似乎忘了「材料之一」就提到康生倒江的信息，或許兩年前他尚未復出，沒有看到？

康生晚年臨終時，突然向鄧小平、周恩來，並通過毛澤東聯絡員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檢舉告發，稱江青、張春橋兩人歷史上都是「叛徒」。這是康生研究中一個最大的看點。

從1975年1月19日至9月15日，康生與鄧小平、周恩來聯繫反江青、張春橋，在康周兩人均病重以至危殆的情況下，這種活動延續了近八個月之久，然而終無結果。《康生年譜》以這些迄今最系統的材料，證實了康生倒江、張事件確有其事。

但是康生臨終時告發江青、張春橋，這的確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康生年譜》給出了如下時間軸：

1974年歲末，毛澤東在長沙聽取周恩來、王洪文匯報時第一次稱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為「四人幫」，並對其提出批評。1975年1月8日，周到釣魚台看望康生。8至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舉行，補選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鄧的地位達到其二度復出後的最高峰。13至17日，四屆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康生當選為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這兩次會議康生均在重病之中坐擔架強撐着與會，在會場上幾度病危出險。

而就在會後的1月19日，康生突然在釣魚台住所對工作人員大罵江青是「叛徒，王八蛋」。幾天後，康生把鄧小平請到住處「談了很長時間」，身邊人員認為與告發江有關。2月17日，康生又強撐病體親到三〇五醫院，與同樣病入膏肓的周恩來長談一個多小時，這是兩人訣別之晤。工作人員事後回憶，認為也是在談告發江青、張春橋之事。

此後在2月18日和4月20日，康生秘書黃宗漢和曹軼歐又分別到三〇五醫院與周恩來談了兩次話。然後就是康生正式約見王海容、唐聞生，要二人轉告毛：江青、張春橋歷史上都是「叛徒」。《康生年譜》根據章含之的信，稱此次揭發發生在1975年「大約八月」。

不同於「老同志」私下發牢騷，康生這次揭發是非常正式的：他先託鄧小平帶話給王海容、唐聞生，要求見面，然後康生的秘書

黃宗漢直接打電話與她們聯繫，約好時間。她們為此還請示了毛澤東，並獲得了領袖的同意。眾所周知，暮年的毛已深居簡出，不見「群臣」，王、唐二人作為「內廷承旨」（所謂「毛的聯絡員」）便是他的代表，康生此舉也就是鄭重其事「告御狀」了。

此時康生與周恩來都已經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9月15日，黃宗漢到醫院，與病危的周恩來談話長達一小時二十分鐘之久。在2月間康、周訣別之晤後，這是兩人最後一次間接聯繫（頁678-82）。

總結上述，從1975年1月19日至9月15日，康生與鄧小平、周恩來聯繫反江青、張春橋，在康周兩人均病重以至危殆的情況下，這種活動延續了近八個月之久，然而終無結果。三個月後，康、周先後於12月16日及次年1月8日去世。他們打倒江、張的願望在毛澤東的拒絕下暫時破滅。《康生年譜》以這些迄今最系統的材料，證實了康生倒江、張事件是確有其事的。

二 康生是中共最高層第一個企圖搞掉「四人幫」的人

《康生年譜》屬於繫年資料長編，不是傳記，更不是評傳，並不能解答康生何以告發江青、張春橋。余先生窮搜史料，把迄今能夠見到的關於此事的資料都收集到一起，為下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礎，這已經是很大的貢獻。但是還有一些資料未收錄其中，包括出自重要研

究者和身邊人的資料顯示，康生反江、張的時間更早，其開始應該還在《康生年譜》所述的時段之前。

例如江青秘書楊銀祿回憶說，江康關係早在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就發生變化。康生曾暗示：毛澤東抱怨江青「迷迷糊糊」，並對江糾纏於與陳伯達的矛盾，而沒有注意「軍委辦事組那五個人」（林彪集團：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表示不滿，康生認為「可以看出主席對江青的看法有了變化」。1974年毛批評江後，「康生的態度急轉直下」，「想急忙與她劃清界線，拉開距離。他拒絕江青的探望，即使見了面也不給她好臉色。重病纏身的康生，於1974年周總理赴長沙向毛主席匯報工作之前，趕緊向周總理揭發江青、張春橋是叛徒。接着他又託人給毛主席帶話，揭發江、張的叛徒問題」。楊銀祿說，這些情況是黃宗漢於1999年告訴他的④。

這個回憶把康生向周恩來、毛澤東告發江青、張春橋的時間提前到1974年末、周毛二人長沙談話之前，這與高文謙的名著《晚年周恩來》記載相吻合。高還明確點出：康生向王海容、唐聞生的揭發也在這之前，周見毛時，兩人均已經知道此事（下詳）。這比章含之的回憶（說康生見王、唐在1975年「大約八月」，《康生年譜》即據此繫年）早很多。

章含之的回憶雖然在先，我還是認為楊銀祿、高文謙之說更可信。一是因為章自己也說她講的時間只是「大約」，並不準確。二是章此信寫於1976年丙辰清明事件鄧



1974年毛澤東批評江青後，康生急忙與她劃清界線。（資料圖片）

小平第二次被毛澤東打倒後，主要是向毛揭發鄧，而非講康生或江青的不是。章把鄧說成是康生揭發事件的主謀，把康生主動約見鄧並通過鄧約見王海容、唐聞生，說成是鄧求見康生並挑唆他向王、唐告密，而王、唐則如何抵制了鄧。整個敘述有許多顛倒因果、邏輯混亂並為其他資料證偽之處。所謂「大約」在8月，我想正是因為鄧在該月的活動達於高峰，特別是轉遞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來信揭發清華問題（導致毛大怒）就在該月發生。章的「大約」其實是服務於倒鄧的附會之詞，應該遠不如王、唐自己的說法可信（下詳）。三是因為高文謙曾作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組（以下簡稱「周組」）組長飽覽檔案，又是專業研究者，楊銀祿的回憶又是他與黃宗漢交流過的，江康關係演變，兩人當時的「大秘」所言應該最可信。

除了以上三者，更重要的理由還在於：如果說康生直到1975年

出自重要研究者和身邊人的資料顯示，康生反江青、張春橋的時間更早，其開始應該還在《康生年譜》所述的時段之前。楊銀祿的回憶把康生告發江、張的時間提前到1974年末周毛二人長沙談話之前，這與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記載相吻合。

一些材料認為，最早提出江青、張春橋歷史問題的中央領導人不是康生而是周恩來。假如周果有對江、張反擊甚至進攻之舉，在「揭批四人幫」時早就會拿來炒作了。但是當時講的是康生揭發江、張，卻從未提及周有（甚至先有）類似之舉。

8月才通過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澤東告密，那麼他早在1月就對身邊工作人員「發飆」，大罵江青「叛徒，王八蛋」，就顯得莫名其妙。正如《康生年譜》引錄的：當時康生身邊護士的反應是「康老你不要和我說這麼機密的事情，我不要聽。你應該找小平同志，向他說」。而根據引錄，接下來的情況卻是「康生大聲說：『我就是要說，江青是叛徒，王八蛋！』」（頁679）。即使病重失常，康生作為一個老特工也不至於那麼失態，在還沒有正式向鄧小平、周恩來、毛澤東這些人提告之前，在一般人面前就「這麼機密的事情」發飆，未免太離譜了。但如果考慮到他此前已經再三通過組織渠道向毛、周、鄧揭發江青，毛卻置若罔聞拒不納諫，那麼在鄧榮升黨中央副主席、他自己被「抬舉」為人大副委員長之際想到此事，忍不住當眾發了脾氣，雖然也有點出格，但作為行將就木之人，也可以理解了。

後來一些材料認為，最早提出江青、張春橋歷史問題的中央領導人不是康生而是周恩來。其根據如下：一是鄧小平之女鄧榕（毛毛）在〈我的感情流水賬——父親鄧小平在動亂歲月〉一文稱：1973年4月9日下午，鄧小平、卓琳夫婦到玉泉山看望在這裏治療的周。周對鄧夫婦稱：「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講完後，他對着卓琳特別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⑤二是官修《周恩來年譜》記載1974年12月26日，周在長沙與毛澤東單獨談話時對毛稱：懷疑江、張歷史上有嚴重政治問題。毛

表示，「他已經知道有關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⑥。而這比章含之所說康生告發的時間更早。但我認為，以這兩條材料說周最早向江發難，是很難成立的。首先應該說，對江、張不滿，甚至就他們的「歷史」私下議論，無論在高層還是民間都其來久矣，很難說誰最早。但是，在政治上有意義的發難，真正進行倒江倒張的活動則是另一回事。例如在街頭公開發難、在會議上攤牌，至少是向領袖正式「進諫」告發，這都是可以弄清楚的。

而且，這裏的關鍵是「倒江」。「炮打張春橋」的口號在文革造反中就有之，林彪一派在1970年廬山會議上也幹過，甚至江青本人就向毛澤東提過張春橋的歷史問題。但至少在體制內，自毛澤東「紅太陽」升起後，江是從來沒人敢動的，而江才是頭頭（如果不算毛的話）。周恩來內心對江、張早已不滿是可以想見的，但在康生之前正式告



張春橋是毛的文革心腹和毛理論的最後闡釋人。
（資料圖片）

發，尤其是對江發難，我以為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當年抓捕「四人幫」時，周恩來備受頌揚，聲譽遠高於毛澤東，華國鋒、葉劍英當時高調宣傳江青對周的迫害，也明顯是借周打江。假如周果有對江青、張春橋反擊甚至進攻之舉，在「揭批四人幫」時早就會拿來炒作了。但是「揭批四人幫」時講的是康生揭發江、張，卻從未提及周有（甚至先有）類似之舉。上述兩個說法只是二十多年後才出現，細考起來都大有疑問。

鄧榕寫其父的那篇文章並未提及江青，只提到周恩來對鄧小平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毛澤東不讓查，而且馬上叮囑卓琳「不要說出去」，顯然這只是周對其部下鄧私下講的話，並沒有打算揭發。像這樣私下發牢騷抱怨「主公不識奸臣」卻又無奈，在當時元老中應該並非罕見，不能說成是對張發難，更不用說對江了。何況這篇文章已經有人非議過，是否可信也難說。按高文謙對周鄧關係的描述，即便這種私下牢騷都似不太可能^⑦。尤其在1973年春，鄧小平剛恢復副總理名號，尚未開展工作，黨內更是剛「恢復組織生活」，尚未明確高層位置，而鄧又剛向毛澤東保證對文革「永不翻案」，這時就馬上與周合謀反對文革新貴，實在難以置信。尤其是對江，事實上鄧榕也沒有這樣說。

至於1974年末長沙之事，也有諸多疑問。首先，12月26日毛澤東、周恩來兩人密談，僅《周恩來年譜》（以下簡稱《周譜》）有載而《毛澤東年譜》卻無^⑧，令人難以理

解。其次，中央文獻研究室領導人金沖及曾明言：「這段時間，（周）找毛澤東談話。只有他們兩個，談了甚麼，沒有人知道。」^⑨然則《周譜》中的二人所言，何來記錄？再次，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倒是有26日周向毛提到張春橋「歷史問題」之說，但同樣完全不涉及江青。而且他明確說，是康生先找周談了此事，周才「把康生抬出來」轉告毛張有問題，而「毛並沒有理睬周的報告，相反還把舉報此事的康生數落了一頓，說：他歷來極左，在延安時期就這樣」^⑩。

這樣看來，先揭發江青的還是康生。而周恩來即便「把康生抬出來」也只敢提張春橋，把江青迴避了。如前所述，半個月後康生在住所發飆，我認為可能就與此有關：康生鄭重其事寄望於託周向毛告發江，周卻謹慎迴避，毛更是不予「理睬」，可把康生氣壞了。

高文謙曾主持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周組」，《周譜》與高書應該同源。高書此處明確引用了至今未公布的原始檔案「中央兩案材料」中的「唐聞生、王海容談話記錄，1980年6月23日」，以及「張佐良：《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1966-1976》，（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版」，官修《周譜》的史源大約也不出於此。類同的史源卻產生了如此不同的敘事，誰更可信姑且不論。至少王、唐談話的直接記錄應該比章含之「大約」言之的二手回憶準確得多。而且金沖及也說，「高文謙書中引用的史料並沒有編造」，只是解釋和引申有（在金代表的官史看來的）偏見^⑪。這樣看來，如果不

高文謙曾主持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周恩來組，其《晚年周恩來》有1974年12月26日周恩來向毛澤東提到張春橋「歷史問題」之說，但完全不涉及江青。而且他明確說，是康生先找周談了此事，周才「把康生抬出來」轉告毛張有問題。

首先發難檢舉江青、張春橋，尤其是檢舉告發江的是康生，而不是周恩來。周響應或助力了康生對張的告發，但對於直接出面告發江，雖經康生的一再動員，他應該仍然是至死都迴避的。

談解釋、僅就事實(尤其是時間這一絕對中立的事實)而言，沒有理由認為工於彌縫的官史會比飽覽檔案的獨立史家所言更可信。

最後，就常理來看，自1973年12月毛澤東操控政治局擴大會議嚴厲批評周恩來、連鄧小平都跳出助陣以來，周面臨江青一夥的咄咄逼人、毛的敲山震虎、其他人包括鄧都不敢仗義執言(甚至還有落井下石之嫌)的困境，一直有「晚節不保」的恐懼，1974年更有「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狂潮，周可以說是戰戰兢兢直到去世。儘管江鬧得太過份時毛也曾經批評過她，並開恩允許周唾面自乾、檢討之後下台階，而周還是在力所能及的工作中盡量排除江的擾，但也僅此而已。以周之一世精明和謹慎，豈會認為到了這時毛還會把自己看得比江更親信，以至於挑頭先咬江？而毛居然不予駁斥，反表示自己「知道有關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假如這是真的，以後的事態就變得完全沒法理解了。

三 失敗的最後一賭

倒是康生，他不像周恩來那麼招毛澤東之忌並陷於恐懼，其「敏感」過度喜歡「亂咬」，毛也素知，卻正好利用，因而從不以為罪。根據康生一貫的脾氣，加之數年久病，罕預中樞之政，其「敏感」或有誤判，看到鄧小平又得勢，毛亦批江青，以為臨終可以再賭一次，奠定自己蓋棺後的地位。這完全可以理解。所以，我認為首先發難檢

舉江青、張春橋，尤其是檢舉告發江的是康生，而不是周，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至於周，他是響應或助力了康生對張的告發，但對於直接出面告發江，雖經康生的一再動員，他應該仍然是至死都迴避的。

現在我們都知道，儘管江青、張春橋做了種種壞事，但說他們早年就是「叛徒」卻並無根據。而康生儘管是特工專家，但從上文可知他其實是重「敏感」甚於重材料的。何況舉告江、張時他已經病入膏肓，完全不在工作狀態，已經不可能挖到甚麼新資料。關於此事捕風捉影的信息，以及王觀瀾、吳仲超兩位「人證」都是他早就知道的(頁681)，但他過去幾十年來一直不講，文革期間還一直與江張二人，尤其是與江和中央文革小組緊密攜手，保持高度一致。就在三個月前江就「風慶輪」事件發難時，他還在病中表態「完全同意」江的意見(頁678)。現在這是怎麼了？

要知道江青、張春橋非比尋常，一個是毛澤東夫人(而且是毛唯一的「政治夫人」)和發動文革的代理人，一個是毛的文革心腹和毛理論的最後闡釋人。江、張比「四人幫」中另兩人對毛的重要性遠高得多。只要毛不死，搬掉他們的難度要比除掉看似位高權重的劉少奇、林彪甚至周恩來都還要高。當然，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地位全繫於毛的恩寵，而且為此得罪了太多的人，所以只要毛一作古，他們的地位也比一般前朝舊臣要危險得多。

康生多才多藝聰明透頂，他是特工專家、意識形態專家、黨際關係專家，甚至還是文物鑒賞家和筆

墨丹青高手。但實際上，他一生最擅長的還是見風使舵。他早年在上海搞特務工作，與周恩來和上海中央「白區黨」系統生死與共。而後來成為「白區黨」剋星，甚至在文革中形成「被捕即叛徒，懷疑被捕過也可以『敏感』成叛徒」的荒唐邏輯。接着，康生在莫斯科與王明搭檔，成為典型的「國際派」。和王明一起回國後，卻又成功地反戈一擊，甚至說出「『二十八個半』沒有一個好人」這種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話^②。後來他緊跟毛澤東直到病入膏肓，而從1960年代起，他在國際「反修」、國內文革中都風頭大盛，登上了人生的巔峰。

而在此次告發江青、張春橋前不久，鄧小平重新得勢。毛澤東在罕見地批評江青之後，又於1974年底第一次批評「四人幫」。在康生自知不起之時，也知道周恩來、毛澤東也將不久於人世。以他「40多年革命經驗」的「敏感」，或會想到毛死後江、張是很難善終的。也許他審時度勢，希望在臨終前再賭一把。

或許他沒想到自己身後毛澤東比周恩來還是多活了幾個月，而且批評歸批評，毛還是為保江青、張春橋而再度打倒了鄧小平。康生的臨終揭發沒起任何作用。後來毛身後江、張終於倒台時，康生的這一「功勞」只在內部文件中一閃而過，很快被人遺忘。反倒是由於他作為「中國的貝利亞」傷害的人太多，遭到文革劫後餘生的掌權者掘墓鞭屍，最後他與他臨終揭發為「叛徒」的江、張等人被歸入同一個「反革命集團」，一併受到了世紀審判。

但是如果天假以年，他能夠活到毛、周身後，又會怎麼樣呢？

四 「中國的貝利亞」與蘇聯貝利亞之比較

康生既然號稱「中國的貝利亞」，我們就來看看本來的貝利亞(Lavrentiy P. Beria)又如何吧^③。斯大林時代晚期的特工首領貝利亞，倒是活到了他們的領袖斯大林死後。他與馬林科夫(Georgy M. Malenkov)、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結成三駕馬車集體領導，也是登上了權力的巔峰。但是僅僅三個多月之後，貝利亞即在一場政變中被捕，隨即被處決。此後在長達近四十年間，人們都認為他作為強硬的斯大林支持者，是害怕這種強硬作風的同僚幹掉的。文革時期在中國，赫魯曉夫幹掉貝利亞曾被認為是「修正主義陰謀第一步」。文革以後也仍然有人把斯大林死後貝利亞的倒台，與毛澤東死後「四人幫」的倒台相提並論。但蘇聯解體、檔案公開後，人們發現恰恰相反：貝利亞居然是斯大林死後第一個要搞「非斯大林化」改革的人，而且幅度之大令人吃驚：

斯大林在1953年3月5日去世，13日，貝利亞便發布〈關於成立偵查小組重新審理特大案件〉等多個命令，並且釋放莫洛托夫(Vyacheslav M. Molotov)夫人等。17日，提出〈關於移交蘇聯內務部一些單位的報告〉。21日，提交命令，從軍隊國防系統開始大平反。很快他又開始複查明格列爾案件、列寧格勒案

文革以後仍然有人把斯大林死後貝利亞的倒台，與毛澤東死後「四人幫」的倒台相提並論。但蘇聯解體、檔案公開後，人們發現貝利亞居然是斯大林死後第一個要搞「非斯大林化」改革的人，而且幅度之大令人吃驚。

正是赫魯曉夫說服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等，為了維護斯大林體制而剷除貝利亞。但到了1956年，也正是赫魯曉夫發表「秘密報告」，做了貝利亞沒做成的事。

件等重大案件，並着手平反；還把反對平反的一批人撤職，包括前國家安全部長、剛升遷中央書記一個月的伊格納季耶夫 (Semyon D. Ignatiev)。25日，貝利亞提交〈蘇聯部長會議關於修改1953年建設計劃的決議草案〉，並開始市場化嘗試和機構改革。他重組了內務部並大削減了其經濟權力和刑事職權。貝利亞又大幅縮減格伯烏 (GPU) — 古拉格 (GULAG) 職能，要把勞改營和勞改隊由內務部移交司法部；很快又下令關閉一批勞改集中營。6月15日，提交〈關於限制蘇聯內務部長下屬特別委員會權力的報告〉，並起草了蘇共中央主席團的相關決議，制訂了大幅度削減該特別委員會權力的條例草案，等等。

此外，貝利亞還要改變外交政策與西方緩和關係，並主張恢復蘇南關係。他通過內務部渠道同南斯拉夫方面秘密接觸，後來搜查他的辦公室時發現一份致南斯拉夫領導人蘭科維奇 (Aleksandar Ranković) 的信，信中表示可舉行一次他與鐵托 (Josip B. Tito) 的秘密高級會晤，地點可以是莫斯科或貝爾格萊德。

鑒於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在治理上的糟糕情況，貝利亞考慮給予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國家自治的特別前景」，可能類似於東歐衛星國。談到東德，貝利亞更主張為恢復與西方的關係，可以考慮放棄東德，以換取馬歇爾計劃 (Marshall Plan) 式的援助。6月2日，〈關於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治形勢健康化〉的決議通過，該決議草擬時，莫洛托夫建議寫上蘇聯反對在東德「強制」共產主義化，而貝利亞則指

示刪除「強制」一詞——他乾脆認為東德不可能實行共產主義。這樣的政策改變在東德引起巨大反響，導致發生「六一七事件」。赫魯曉夫、馬林科夫等人無法容忍，終於決定剷除貝利亞。

今天我們讀到這些歷史，幾乎難以置信：這簡直堪比〈五七一工程紀要〉，哪裏是甚麼「四人幫」？幾乎就是戈爾巴喬夫 (Mikhail S. Gorbachev) 的前世啊。檔案表明，正是赫魯曉夫說服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 (Kliment Y. Voroshilov) 等，為了維護斯大林體制而剷除貝利亞。但到了1956年，也正是赫魯曉夫發表「秘密報告」，做了貝利亞沒做成的事！而且，正如中共〈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所云，赫魯曉夫曾經是斯大林崇拜最突出的鼓吹者、大清洗最嚴厲的劊子手，也是斯大林最信任的人。這真是「凡事皆有可能」。

五 談歷史敘事中的「思想史」與「陰謀論」

貝利亞如此，「中國的貝利亞」呢？《康生年譜》的材料顯示，最早想搞掉「四人幫」的（雖然只提到江青與張春橋，但沒了江、張，王洪文和姚文元還能獨善其身？）不是華國鋒也不是葉劍英更不是鄧小平，恰恰就是令人生畏的特工專家康生！他想通過揭發「叛徒」讓毛澤東、周恩來搞掉江、張，雖然沒有成功，但如果毛、周去世後康生仍然活着而且還有政治能量，他會罷休麼？

當然，「貝利亞改革」檔案的公布並不能洗掉斯大林時代貝利亞殺人如麻、道德敗壞的劣迹，康生告發江青、張春橋也不能掩蓋他過去助紂為虐、整人無數的惡名。更何況當年貝利亞確實是有推翻斯大林暴政的事實，而至少就現有資料看，「中國的貝利亞」康生並沒有批判江青（實際上是毛澤東）在文革浩劫中的角色，他只是要以歷史上的「叛徒」罪名除掉江、張個人。

江青、張春橋在歷史上真是「叛徒」嗎？當然不是。在作為「四人幫」被中央逮捕之前從來沒有被「反動派」逮捕過的張春橋不可能「叛變」。抓「四人幫」時雖然提到康生揭發他，但官方公布他的歷史「舊賬」只是早年未入黨前作為文學青年發表過與魯迅觀點不同的文章，以及社會關係中有人後來被發現是國民黨的「特務」——因此當時的宣傳也只說他是「特務」（這當然也很荒唐）而非「叛徒」。

至於江青早年雖然被捕過，但在延安時就被審查清楚。康生說王觀瀾是江「叛徒」問題的「人證」，實際上王本人與江早年並無交集，而是王的夫人徐明清在1930年代於上海與江共處，共同為中共做過一些工作，並曾先後分別被捕，後皆獲釋。延安審幹時這些情況康生就已知道。文革中徐因此被打成「叛徒」，她曾向了解她往事的江求救，而江見死不救（可證明江的冷酷，但不能證明江是「叛徒」）。抓捕「四人幫」後，應該是基於此前康生的說辭，江青專案組強迫徐寫材料證明江也是「叛徒」。康生被中共否定後，徐於1980年正式獲得

平反，洗清了「叛徒」罪名，她被專案組逼迫寫下的材料也被推翻^⑭。

而臨終的康生要除掉江青、張春橋，卻只拿這些歷史上的「莫須有」之罪做文章。由於現在看來並無「叛徒」實證，甚至可以說是誣告。當然我們也可以理解為由於現實政治是毛澤東做主，康生不可能非議，也只能如此。以「宮廷政治」方式發動文革，又以「宮廷政治」方式終結文革，抓捕「四人幫」不也是如此嗎？康生如果多活幾年能夠成功搞掉江、張，推出某種「新政」也非常可能。但這種假設不同於貝利亞的實際行事，並沒有史證意義。康生的歷史地位不會因這種沒有實現的可能而改變。

但是在方法論上這卻引申出一個問題：蘇聯式國家體制下根據一個人的過去能否推測他的未來？而這種體制本身的未來又是否能夠推測呢？我曾提到過「蘇聯式國家的『測不準原理』」：根據貝利亞的過去，誰能想到他在生命最後數月會做出檔案披露的那些事？而貝利亞又能想到赫魯曉夫會做他未及做的事嗎？

東歐歷來是坐着蘇聯坦克回國的「僑蘇派」整治各黨「國內派」以保證對蘇效忠。匈牙利在拉科西（Rákosi Mátyás）、格羅（Gerő Ernő）倒台後，赫魯曉夫起用納吉（Nagy Imre），除了納吉符合他「非斯大林化」的想法外，也是因為納吉不僅屬於「坐蘇聯坦克回國」者，而且他僑居蘇聯長達十七年，超過包括拉科西在內的絕大多數的東歐親蘇領導。赫魯曉夫認為他既贊成自己的「修正」，又絕不會反蘇——但

當年貝利亞確實是有推翻斯大林暴政的事實，而至少就現有資料看，「中國的貝利亞」康生並沒有改變江青（實際上是毛澤東）文革浩劫政策的主張，他只是要以歷史上的「叛徒」罪名除掉江、張個人。

戈爾巴喬夫之前誰也沒料到「蘇東劇變」，這樣的「測不準」中國又何能成為例外？林彪出事前誰能想到有〈五七一工程紀要〉？對江青、張春橋不滿的人應該比比皆是，但誰又能想到高層中第一個想實際除掉他們的人竟會是瀕死的康生？

恰恰是納吉，成為戈爾巴喬夫時代以前東歐唯一一個宣布退出蘇聯陣營的自由化領導人，因此在1955年被驅逐出黨。

蘇聯鎮壓1956年匈牙利革命、1968年捷克改革後，都沒有起用原以為會被起用的兩國原有親蘇派大老，如匈牙利的赫格居斯(Hegedüs András)、捷克斯洛伐克的英德拉(Alois Indra)等。而獲蘇聯起用的卡達爾(Kádár János)、胡薩克(Gustáv Husák)，都分別曾是納吉、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的密友、改革派中堅，也都是舊體制受害者(曾在冷戰初期的「斯大林恐怖」中被判重刑，受害程度比納吉、杜布切克更甚)。但恰恰是他們，一翻臉就變成最鐵腕的蘇聯代理人——甚至在蘇聯願意保留納吉性命的情況下，卡達爾仍堅持要處決納吉。

相反，1955至1956年擔任匈牙利總理的「死硬的斯大林主義者」赫格居斯是被納吉趕下總理寶座的，他也是最早呼籲蘇軍進入匈牙利鎮壓「反革命」的人。但是蘇聯在匈牙利革命後沒有起用他，到1968年他卻搖身一變，在匈牙利領頭抗議蘇聯侵略捷克，被開除黨籍後便成為匈牙利「老資格」的「民主派」。

而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戈爾巴喬夫，他作為強硬派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等看中的接班人，卻離經叛道，最終結束了蘇聯。有「事後諸葛亮」解釋說，安德羅波夫也想「改革」，所以提拔了戈爾巴喬夫。但其實克格勃(KGB)出身的安德羅波夫比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更強硬，1956年就是他作為蘇聯駐匈牙利大使促成蘇軍鎮壓匈牙利革命的。如果說晚年安德羅波夫要「改革」，那也是「擰緊螺絲」的「改革」，與後來戈爾巴喬夫做的恰恰相反。戈爾巴喬夫過去如果有一丁點自由化苗頭，安德羅波夫能看中他？毫無「苗頭」的人上台可能打出另外的牌，貝利亞、赫魯曉夫不就是先例嗎？

無怪乎除了一些「正義必將戰勝邪惡」的信仰之言外，戈爾巴喬夫之前誰也沒料到「蘇東劇變」，一些所謂的預言家，仔細辨析其實都只是「事後諸葛亮」的附會而已。這樣的「測不準」中國又何能成為例外？林彪出事前誰能想到有〈五七一工程紀要〉這樣的文字？對江青、張春橋不滿的人應該比比皆是，但誰又能想到高層中第一個想實際除掉他們的人竟會是瀕死的康生？文革中上海造反派「工總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司令部)歷來被認為是「奉旨造反，奉旨受招安打方臘」的典型，其頭頭王洪文甚至一度被毛澤東培養為接班人選。但工總司早期領袖潘國平1975年卻被人揭發出驚人的私下言論：「我們對美蘇的譴責和批判完全是無中生有，是雞蛋裏挑骨頭，是為了轉移人民視線，緩和國內外階級矛盾和緊張局勢，採取嫁禍於人的方法」；「我國現在面臨經濟危機，全國動亂不定，上層內部分裂，爭權奪利，人民沒有政治權利和民主自由」^⑮。

可以說，與當時無數被槍斃的「反革命」相比，論罵毛澤東的激

烈，〈五七一工程紀要〉都能佔鰲頭；論「復辟資本主義」，潘國平也不遑多讓；而要論粉碎「四人幫」，康生也堪稱前驅。林彪、工總司和「中國的貝利亞」，應該都是那十年中國「極左」的標竿了，這真是「王莽謙恭未篡時」，「一生真偽有誰知」。

或許正如那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確，歷史是人的行為構成的，而人的行為是由思想支配的。但是在某種體制下，人們都帶着面具生活，說出來的往往並不是真正所想，而真的思想誰也不說。別說外人沒法揣測，「親密戰友」之間誰也不知道誰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

君不知臣，臣又何能知君？劉少奇曾是毛澤東的親信，但毛要搞的文革是怎麼回事，劉至死都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張春橋應是毛晚年思想頭號闡釋者了，但他的「上海公社」顯然就會錯了意^⑥。

君對臣測不準，臣對君測不準，整個國家的方向又有誰能測得準？國外許多「蘇聯學」、「中國學」家熱衷於分析這類國家的各種派系，並以這些派系的起伏推斷這類國家的走向。但誰是哪派他們永遠也測不準，原因就在於此。貝利亞是「斯大林派」嗎？林彪是「毛派」嗎？鄧小平是「劉派」還是「周派」？康生難道不是典型的「文革小組派」嗎？別說他人「測不準」，連他們自己又何嘗能夠把自己定「準」過？極左「革命」摧毀傳統道德的結果，使人際關係更加不擇手段。坑親殺熟司空見慣，「幫派忠誠」比傳

統時代脆弱得多，那就更加「測不準」了。

在我看來，關於「思想史」和歷史的關係，有兩個相反的極端誤解，就是對民主政治、公開政治中的問題，時下流行用「陰謀論」來解釋；而對於「宮廷政治」、「黑箱」政治中的問題，卻流行用「形而上」的思想來解釋。但常識告訴我們，「黑箱」中的事情真的沒那麼多「思想」。像康生那樣飽學馬列思想者，在中共高層中算是頂尖的了，但他的行事不能以「思想」解釋的也比比皆是。他對一些人通情達理幫助解救，對另一些人極端「敏感」無中生有，這是基於甚麼「思想」？康生幾度改換門庭是「思想轉變」，還是為了謀權見風使舵？至少在他反戈一擊大整「國際派」後，共產國際頭頭季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v) 就密信毛澤東指其人品不可靠 (頁 132)，後來中共蓋棺定論不是證實了此說嗎？他在延安審幹時就知道徐明清和江青的往事，卻不妨礙他與「領袖夫人」在文革中狼狽為奸，幾十年後臨終又來揭發「叛徒」，這又是基於甚麼「思想」？

至於「通向地獄的路是善良鋪就的」那種反道德的謬說，民主政治中的思想者用以提醒這種政治中的人們警惕烏托邦還可以理解，但在「宮廷政治」中使用這種說法，把作惡者冠冕堂皇的說辭信以為真，說那都是好心辦壞事的「理想主義烏托邦」，彷彿那些強人如果不是好心過剩、「理想」太虔誠，就不會作惡，這是真的嗎？歷史真可以這麼解釋嗎？

關於「思想史」和歷史的關係，有兩個相反的極端誤解，就是對民主政治、公開政治中的問題，時下流行用「陰謀論」來解釋；而對於「宮廷政治」、「黑箱」政治中的問題，卻流行用「形而上」的思想來解釋。

相反，公開政治、民主政治中的事例倒是需要追究思想動因。這不是說政客就有多乾淨，但既然這種政治是「說服的政治」，心底的骯髒是不能用來說服選民的。思想（社會思潮）才是理解這類政治的鑰匙。

《康生年譜》描述的當然不是後一種政治。本書好處就在於它一點也沒有妖魔化康生這個人，但在特定的規則（或「潛規則」）下他能夠如何行事，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豐富的案例，而它的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對康生個人的評價本身。

註釋

- ① 本文引錄康生言行不另註者，均出自《康生年譜》相應時段。
- ② 師東兵：〈「應當恢復康生的本來面貌」——訪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遺孀曹軼歐〉，《華夏文摘增刊》，第647期（2008年5月19日），www.cnd.org/cr/ZK08/cr480.gb.html。
- ③ 拜倫（John Byron）、帕克（Robert Pack）著，顧兆敏、顧兆平、金朝暉譯：《康生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6。
- ④ 楊銀祿：〈我所了解的江青與康生的關係〉，《同舟共進》，2011年第12期，頁33-35。
- ⑤ 毛毛（鄧榕）：〈我的感情流水賬——父親鄧小平在動亂歲月（續五）〉，《中華兒女》，1999年第11期，頁23。
- 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87-88。
- ⑦ 高文謙指出，鄧小平與周恩來雖然早在留法時就認識，但

當時周已是旅歐中共黨員中的頭頭，鄧還是少年，應該並無深交。而中央蘇區時期上海中央排擠毛，「鄧毛謝古」（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就是首當其衝的「毛派」，毛後來也多次提及。加之1973年毛整周時，鄧還作了份量很重的附和，顯然鄧周關係並不比鄧毛關係親密。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頁469-73。

⑧ 《毛澤東年譜》記載的談話在12月23、24、25、27日，唯獨沒有26日。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562。

⑨⑩ 徐天：〈《周恩來傳》作者反駁文革期間周恩來軟骨頭說〉，《中國新聞周刊》，2013年10月28日。

⑩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540-41。

⑫ 汪雲生：〈「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來龍去脈〉，新語絲電子文庫，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modern/28ban.txt。

⑬ 以下關於貝利亞的資料，均見於英、中、俄諸文種「維基百科」，恕不一一加上註釋。

⑭ 參見東平、王凡：〈徐明清與江青關係的事實真相〉，《華夏文摘增刊》，第571期（2007年5月7日），www.cnd.org/cr/ZK07/cr405.gb.html。

⑮ 參見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下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頁1423。

⑯ 1966年末毛澤東在生日宴上「為全面內戰而乾杯」，張春橋就納悶了一輩子，二十六年後他還對女兒說：「我始終沒明白這杯酒的含義。」參見張春橋：《張春橋獄中家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頁128。